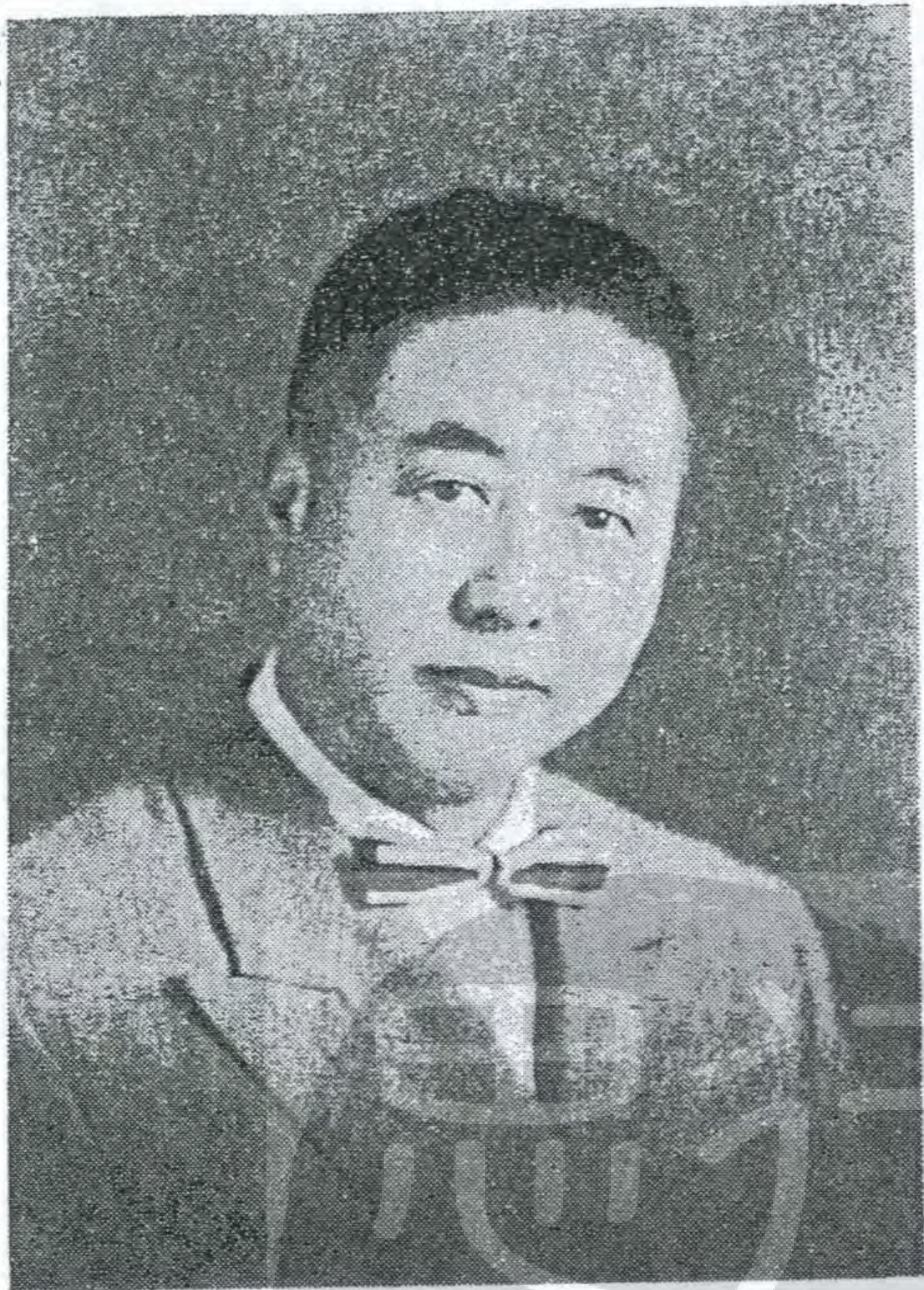


政大遷校與大邑之戰

楊希震

政大在中央黨務學校時期，我是學生，在中央政治學校時期，我是教授，在國立政治大學時期，我擔任過訓導長，代理校長。

所以我與政大的關係最爲密切，戰亂時期政大遷校，由我主持，經過情形，知之最詳，特將事實分述於後。



名，遷校杭州

「旅行」為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本文作者任政大訓導長、代理校長率領全校師生自廣州遷校重慶時攝於南溫泉。

三十七年冬，徐蚌會戰，國軍失利之後匪軍迫近長江。南京專科以上學校的學生，發動反飢餓運動；投機的教職員極力向共匪靠攏。政大有極少數教職員也隨聲附和，主持其事者爲經濟系教授余精一。因他在校有長久的歷史，故富號召的力量。附和他的教員和學生雖不多，然因有校外的支援，其

聲勢却甚浩大。他們主張：（一）反對政大遷校；（二）禁止校物遷出學校；（三）迎接共匪「解放南京」。可是我們反共的教職員和學生佔絕對的多數，與他們對抗。我們有愛國的熱忱反共的決心，未因其威脅而改變我們的反共主張。但在經費方面缺乏支援。然而我們有克難的精神，愛校的誠意，亦不因受經費的限制中止我們的遷校運動。三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本校行政會議，接受我們的意見，爲避免反對遷校者籍口，乃決定本校員生旅行杭州，自由參加。名爲旅行，實是遷校。全校學生有八百人，報名參加赴抗者有七百六十五人，各年級學生都有，尤以三四年級學生爲最多。教職員，工友，及眷屬報名的共有十六人。

學校在遷移期內，一切有關遷移事務，完全由遷校委員會負責，這個會的負責人由教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工友代表擔任。採取民主的方式，以選舉產生職員經會議派定工作，學校當局居指導的地位。

二十五日遷校會在南京開最後一次會。校外

和談空氣正高唱入雲，校內反對遷校的活動更為積極。在教職員中持觀望態度的人為最多，而學生的意見也不一致。所以這次會議到會的人都非常緊急。我在此次會議說明了幾點：(一)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雖極惡劣，而我們反共的決心和遷校的主張是不變的。(二)行政會議決定用「旅行」而不用「遷校」的名義，完全是顧及環境與事實。

(三)我們不怕任何恐嚇與反對，堅決的貫徹我們的主張，政大應隨政府遷移，(四)遷校與不遷校的主張，不是立場的不同，這是忠與奸之分。我講完之後，遷委會負責人學生代表王瑜同學即起立發言，他說的幾句話，我至今還記得。他說：「遷校不是好玩的事，而是最痛心的事。我們去杭州不是為遊覽，而是表示我們堅決的反共，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效忠，和愛護我們學校過去的光榮歷史」。他這幾句話是代表多數學生的意見。也說明了我們去杭州的目的。在本校遷移開始的階段，他為同學服務出力最多，可是他受罵也不少，他始終是任勞任怨，有毅力，有組織力。四十年春他從大陸逃出，到了香港，與我通信多次，因無法入境，他到日本去了。聽說他現在在日本經商。

顧校長在決定學校遷杭州之後，即回上海養病。教務長陳石孚先生，也往上海去了。總務長翟楚先生，因故傷足，不能行動。學校失去行政的重心，紊亂極了。世局一天壞一天，反對遷校的教職員，又積極活動反對我們。在這種困難情形之下，我率領主張遷校的師生於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六時開始遷校。到了下關，乘客擁擠，秩序紊亂。我們預定的車輛，全被軍人佔據。我向路局交涉多次，始得車皮五節。為免發生意外改在和平門外上車。次晨三時開車。交涉車輛時，鄭翔同學出力最多，他機警多謀，克服了火車機長的反對。行李二千餘件由同學保管。做得有條不紊，這都是大家所稱道的。

師生在杭深受壓迫

二十九日晚到杭州住杭州師範學校。杭師本來不願意借給我們，由於邱友錚先生向浙江教育廳的努力交涉，才借得這個暫時留居的場所。杭師的校址在西湖邊，風景優美，交通便利，時值寒假，師校全校學生都回家去了，我們住在那裡可以說相當的舒適，顧校長因病留上海，他請我在杭州主持一切。我因為時常要與顧校長商議解決許多意想不到的麻煩事情。必須親往上海去見顧校長。我將學生的意見，向顧校長報告，顧校長有所指示，我回杭後即向學生宣達，因此，我奔走於滬杭之間，不知有多少次。

杭州的風景雖然很好，可是我們沒有閒情逸緻去欣賞。時局一天緊一天，南京有許多機關也搬到杭州，更加使我們心理上的不安。我們在杭州開課麼？還是遷到其他地方呢？學校都沒有作決定性的打算，我們只有在杭州等待和觀望。

不久，杭州師範學校開學，杭師校長天天趕我們走。他趕我們的方法真是惡劣極了。他編一個趕我們走的歌，派杭師附小的學生，在我們住的地方，結隊唱歌，使我們不得不走。在這歌詞中兩句最使我們不能忍受的，即「你們應當回南

京迎接光明，不應當住我校久假不歸」。我為此事向杭師校長提出嚴重的質問，幾乎發生衝突。大部份師生因居住不寧，以致心緒極為不安。頗有如文天祥所說：「山河破碎風拋絮，身世飄搖雨打萍」之感。

在南京未走的員生，受余精一及共匪滲透份子的利用，對我們採用分化的方法，一方面攻擊我個人，製造許多對我不利的謠言，想使我與學生之間發生摩擦，並且寫了很多匿名信恐嚇我。他們對我下了不少工夫，其所以如此，是由於他們認為將我打倒了，則反共的學生失去領導而會瓦解。可是大家知道他們的詭計，毫不為其所動，謠言不攻自破，不久便息了，攻擊自然也就失去作用。因為「是與非」，「忠與奸」是相對的，有「非」才知「是」之重要，有「奸」才知「忠」之可貴。決不是花言巧語，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所能中傷。本校反共的員生能「明是非」，「辨忠奸」，未中其離間之計。所以我們能團結一致，親愛精誠，而不被親共份子所分化。

另一方面他們大張旗鼓，在南京正式上課。派代表多人到杭州向我們宣傳，以說服和利誘的方式，勸我們回南京。有極少數人「改變」，而是因為在杭州住處不安，不能上課，南京既已上課他們祇好回學校去了；還有些同學也不是受了他們的宣傳，乃是由於自己打算回南京看一看，如時局緊急，再回杭州。因此，他們也回南京去了。不過，大多數師生抱定決心還是不回南京。

二月五日行政院長孫科宣佈行政院遷廣州辦公，南京惟留代總統辦事處，專辦「和談」事宜。

於是在杭的全體師生一致向顧校長要求，學校應即遷廣州。同時，留在南京的師生，也要求顧校長回南京主持校務。

由杭州遷校至廣州

三月顧校長到杭州開師生全體大會，經過三小時的討論，顧校長最後決定，本校遷廣州。我們即作遷移的準備。張金鑑先生向顧校長建議，留杭師生乘火車，由杭州至江西轉湖南至廣州，他說：他與交通部商妥，可予優待。我以火車路線太長，且由杭至穗沒有直達車，留杭師生數百人，由杭州至江西，轉湖南，到廣州，路線太長，中途轉車，容易發生意外，我堅決主張，留杭師生，同上海乘船至廣州，最後顧校長接受我的建議，決定乘船，幸而未乘火車，不久，浙贛路中斷。四月六日起，留杭師生開始赴滬，分批乘輪轉穗。黃龍先先生在滬負責接洽船隻。二十三日國軍撤離南京。我率領留杭辦理結束最後一批學生數十人於二十四日離杭赴滬。

我和本校師生及眷屬，約二百餘人由滬乘執信輪赴穗。二十六日上船，二十九日開船，五月二日到廣州。是日大雨傾盆，我們皆未攜帶雨具，衣服盡濕，極為狼狽。

在廣州的本校校友，對學校遷穗，幫助甚多。在我們未到穗之先，已擇定大壩墟為臨時校舍。該墟附近有祠堂三所，每所相隔約里許，房屋高大，內部廣闊，光線充足，頗宜作教室及宿舍之用。由大壩墟至廣州，約三十華里，有汽車可通，水道亦能達，交通稱便。

我到壩墟時，教職員及眷屬，可以居住之房屋，皆已住滿。我的全家只得住了一間停棺木的房子，有門無窗，濕氣很大，住了一個多月，我的小孩都生病了。

在我們住的地方不遠有一條河，水清而各處深淺不同，附近居民於天氣炎熱時常在此河游泳。新聞系學生陳致恆，安徽人，精明能幹，高個子，在河中游泳，竟不慎而遭滅頂之禍。全校師生對他非常惋惜。

我們到了壩墟不久，京滬各校的黨團同志及反共堅強的學生，陸續到了廣州約有數百人；華北各校的流亡學生，也先後到穗，有三四百人之多。他們都請求教育部分發學校。我校奉教育部令，盡量收容他們在本校寄讀。曾專為他們舉行考試兩次，錄取寄讀生三百餘人。

六月，顧校長在臺北，因病堅請辭職。適我軍在湖南失利，匪軍迫近廣東，廣州局勢極緊，學校不能無主。教育部准顧校長的辭職命我為代理校長。因為政大的幾百學生是我由南京率領出來的。見危受命，義不容辭。我接事之後，即進行數事：

(一)學校遷台灣，如不能成，即隨政府遷移。當時台灣省政府，不准大陸上任何大學遷台灣。

因此，政大遷台，未能成功。我為政大遷台事，曾由廣州到台中，求助於陳果夫先生，他也「愛莫能助」。我見果公除遷台事外，並報告學校近況，請求指示學校今後大計。他說：「遷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是一件大事。政大在抗戰期內，遷芷江，發生風潮。當時學校有許多人

幫助學校，現在你一人擔當，而且大局逆轉，學校處境，今非昔比，更加困難，你須謹慎為要！你決定學校移台不成，以後只有隨政府遷移是對的，你須堅守這個原則。」果公這段話給了我很大啓示。

(二)整理學籍，呈報教育部。中央黨務學校及中央政治學校時期，隸屬於中央黨部，每屆學生錄取人名冊及畢業生名冊，只呈報中央黨部不報教育部。我根據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中央第三十次常會決議：「中央政治學校改為國立政治大學。凡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與大學畢業之資格相同。」畢業生指導部，已將畢業生之資料，帶至廣州。乃加以處理，呈報教育部請求追認學籍。不久獲教育部批准，王慕曾先生，辦理此事，出力最多。

(四)校政公開，財務公開及職員凍結。學校在遷校期內，一切校政，及財務皆取公開方針由遷校委員會處理一切，無需增加職員，故予凍結。當時最感困擾的是極少數先生，他們的親戚朋友，逃到廣州，無處謀生，要到學校當職員，有十餘人之多，我主張在遷校期內，一切事務由遷校委員會辦理，這個委員會是由教職員，學生及工友共同組織而成，不需要添加職員，以免加重學校的包袱，他們向我施以巨大的壓力，我為學校不能不堅持原有主張，因此，得罪了他們，他們就搗亂造謠，無所不用其極。幸而全校師生支持我的主張，他們的搗亂未能成功，造謠也未生效。羅家倫先生因公到廣州，我去見他，他問我有甚麼困難？我將這件困擾的事向他報告，他說：

「俾士麥說：『凡求不朽之功業者，不免招謗』，政大遷校，雖不能說是一件不朽的功業，但是，一件大事，招謗也是難免，你須容忍」。他給了我很大的啓示，以後遇事我便盡量容忍。

中央政府在廣州未作長期打算，而匪軍威脅廣州，一天比一天嚴重，我校不能不遷。八月奉教育部令，本校遷重慶。

自穗遷渝重返南溫泉

本校由穗遷渝，路途遙遠，中途轉車數次，麻煩甚多。遷校委員會以責任重大，應行改組，並擴大其組織。改組後之遷委會，由劉興漢同學負責，他出力最多，貢獻極大。

沿途分爲廣州、梧州、桂林、貴陽、及重慶五大站。每站設五人小組，其中教職員一人，學生三人，工友一人，負責接洽車輛及臨時食住地點。重慶設辦事處，請黃強中先生主持。八月中旬各站人員，分別派定，即時出發。全校教職員、學生、寄讀生、工友、及眷屬共九百餘人，分爲五大隊，二十餘小隊，八月二十五日第一大隊離穗赴渝，每隔數日，出發數小隊，在九月底以前各隊先後到達重慶。只有少數負有重要職務之人員由穗乘飛機飛渝。各站負責人員，都非常盡責，充份發揮服務的精神。桂林站是廣州與貴陽之間的中心站，事務煩雜，由林深淵同學負責。經過此站的師生無不稱贊其服務週到。後因公忙過度，患傷寒症，醫治無效，死於重慶。

我們回到了南溫泉如同回到自己的家裏一樣，非常愉快。政大在南溫泉所蓋的臨時房屋，還

是仍舊存在，沒有很大的破壞，不過因年久失修，有許多地方不如從前之整潔美觀。當抗戰勝利，本校還都時，曾與地主立約，政大在南溫泉所建之房屋，都送與地主。如在十年內政校再遷回南溫泉時，原有的房屋，無條件的由政校使用。依約我們此時回到南溫泉，校舍應該不生問題。可是當政校離開南溫泉不久，地主就在我們的原有校址，辦了一個南林學院，有數百學生，其中份子異常複雜，多爲共匪的職業學生，他們決不讓出。巴縣縣立農業學校也設在我校原址之內，也不遷讓。經過多次交涉，並補助遷移費，農校始出，南林學院讓出一部份房屋。

十月初我校正式上課，寄讀生舉行編級考試，並在南溫泉本校及成都兩處報考一年級新生，報名者極爲踴躍，新生入學考試，已分別舉行。十一月初匪軍入川境，重慶人心浮動，中央作積極之疏散，不久，有遷蓉之決定。因此，本校不能再作遷移之準備。我堅決主張隨政府遷蓉，全體學生之意見與我相同。然教職員中有主張遷移者，有主張在渝應變者。而主張應變之教職員人數甚少，他們自知勢孤力弱，乃改變論調，力主遷雲南而反對隨政府遷成都。並放出謠言，以成都軍校已遷昆明，其實他們非真主張遷雲南，不過藉此以反對學校隨政府遷成都。並向教育部建議政大遷雲南，教育部乃有令本校員工結隊前往大理之令。我接此令後，即呈報教育部，堅守隨政府遷移之原則，不能遷大理。後得教育部之允可。二十五日我軍在南溫泉白鶴嶺一帶佈防，本校師生，工友及眷屬全體遷入重慶市區。

二十七日南溫泉棄守。二十八日晚重慶秩序大亂，我校遷委會所雇之汽車被軍隊徵用。我決定全體員工及學生化整爲零向成都進發。

我於南溫泉棄守之前本可乘空軍飛機來台灣。然因校務尙待處理，不忍離渝故放棄此機會。後來教育部爲在重慶各專科以上學校之負責人所準備飛蓉之專機，已爲我留位置。我因校務羈身，不願棄之不顧，於是作罷。在渝危急時我校長張留渝應變的少數教職員，有計劃的使我不能離開重慶，百般爲難。後經極艱苦之掙扎，得學生之保護，我始得於二十九日傍晚乘學校的汽車赴蓉。次日晨匪軍即入渝市，相隔不過數小時。

徒步至蓉參加軍校

我乘校車離渝時，沿途車輛，擠擁不堪，後車接前車，綿延數十里。一車發生障礙，以後的車即不能前進。我車由重慶行至山洞，走了六個鐘頭。我們原雇之車，被軍隊扣留後，有許多同學步行至成都。也有因爲沿途車行甚慢，有逃亡經驗的學生都知道在此種情形之下，見車上有空位，或是有立足之處，即可一躍而上，如有人拒絕，談幾句好話，或是付少許車費，即可了事，以達到乘車的目的。本校寄讀生有逃亡經驗，大多數是採取這種辦法，我與舊生也跟他们學。所以我見沿途許多車子上都有我與舊生的學生。

十二月一日我到了成都，這些坐汽車的同學也到了成都，約計有數十人。我想本校學生到了成都，住處是很容易解決的。因爲我認識幾個成都市內的中學校長，向他們借幾間房子，以爲我與

學生寄居之所，應當是沒有多大問題。那知道出我意料之外，沒有一個學校願意借給我們。因為政大學生反共出了名，他們如果允許政大學生在其學校寄住，將來共匪來了，他們會有許多麻煩。所以他們完全拒絕。後來，蒙黃季陸先生的幫助，借得四川大學先修班一部份房子，本校學生在蓉居住的問題才算解決了。

二日至五日，本校學生徒步到蓉者又有三百多人，加上以前的學生，共計約近四百人。他們經過長途跋涉，食住不安，苦痛極了。當時國軍節節失利，人心渙散，已成瓦解之勢，可是他們的愛國熱忱，毫未因之減少。共匪勢力擴大，前線兵力增加，後方活動加強，以威迫利誘之手段，爭取各階層之份子，有許多青年轉變態度，投機靠攏，然而我們師生的反共決心，不但未有動搖，而且比前更為加強。女生和男生一樣，一致要求，投筆從戎，參加軍校，武裝反共。四日午後他們在川大先修班的禮堂裏，環繞着我，很親切的與我商談入軍校的問題。他們的熱情、真誠、勇敢、愛國、和堅強反共的精神，使我感動落淚。我極力鼓勵他們並答應他們，一定設法達到他們入軍校的目的以完成他們的志願。學生也派代表向軍校張校長請求，張校長耀明先生致陳固亭先生函中，說明政大學生入軍校之經過甚詳（見四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中央日報副刊），他說：

三十八年多，川局逆轉，重慶陷匪，總統蔣公於十一月三十日，由渝飛蒞成都，駐節軍校，指揮西南軍政大計，此時國立政治大學同學二百餘人，甫自渝步行到達成都，

雖長途跋涉，歷盡艱辛，精神仍甚振奮，推舉代表以慷慨赴義，滅此朝食之悲壯情緒，請纓殺敵。當由弟面報 總統特許編入軍校二十四期新生總隊，由政大代校長楊希震率領入軍校。學生加入新生總隊時，一種蹈厲奮發無敵無畏之氣慨，堅定激昂如崗如陵之精神，實予即將畢業第二十三期同學以無比之感奮與歡迎。

政大同學進入軍校編隊之前，在校官生，均敬佩其同仇敵愾，激烈昂揚之勇氣，人樂於幫助伊等易裝治械，而長途跋涉之每一政大同學，更是堅毅沉着，精神飽滿。」陳固亭先生是本校校友，他說：「這一封信讀後，感到無限的悲痛，同時又覺得他們起義的壯烈……他們這種不計成敗利純的勇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不僅創造了政大光榮歷史的一頁，而且樹立了政大報國家的楷模。」

大邑之戰碧血千秋

政大同學入軍校，僅逾一週，大局逆轉。昆明盧漢叛變，整個局勢突告嚴重。軍校奉命遷至西昌，軍至大邑與匪軍遭遇。政大同學在此次戰役中犧牲最大，由左列各同學報告中可以知其大概。

（一）袁珊同學的報告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新生總隊奉命向西昌出發，是日陰雲密布，淒風苦雨，天氣很壞，好像上帝有意予我們考驗似的。說也奇怪，我們平

日手不提肩不挑，在此緊急時刻居然能肩起數十斤的裝備，行起軍來，精神飽滿，士氣旺盛，不讓老兵分毫，是日步行至雙流，十日抵新津，十一日向彭山前進，行至接龍場，前方發現敵人，遂就地紮營，構築工事，嚴陣以待，準備予來犯匪軍迎頭痛擊，十二日繼續前進至謝字場。當時通往西昌之路已被截斷。乃留駐謝家場數日。王隊長深知政大同學受過文武合一的教育，祇須稍加戰鬥訓練，可使成一枝勁旅，彼遂趁此良機加強訓練，時間雖短，但成績甚佳，故無論瞄準，射擊及投擲手榴彈，均能了解要領，運用自如。二十日晨，我們行軍至蘇場附近，與匪劉伯誠部第二野戰軍第十二軍第三十八師遭遇。」袁珊同學現在德明專校任教。

（二）陳寬強同學的報告

「蘇場是川西大邑縣境的一個小村落，我們佔領的陣地在蘇場旁邊，是面積不廣的一片墳地，正前方有一小溪蜿蜒環繞，右側有磚牆一座橫跨其上，溪畔林木疏落，前方展望良好，一目瞭然。我隊同學因係見機受命，未及構工事，各利用自然地利地物，據河防守，因陣不大而未能疏開，火力密集，頗為旺盛，戰端初啓，匪軍欲由正面渡河，為我猛烈火力擊退而未得逞，但我方之密集陣地亦為敵人發現，於是匪軍放棄正面攻擊，轉向左右包抄，以迫擊砲向我陣地猛轟，繼試射之後，即作威力射擊，一時陣地上彈下如雨，同學陣亡及受傷者頗多，在彈塵翻滾中，傷者呼痛之聲遍起，某同學高聲疾呼「大丈夫流血不

流淚」。而傷者呻吟之聲竟因之大為低沉。」陳寬強同學得政大博士學位後現任律師。

(三) 梁效今同學的報告

『我是第八中隊第一區隊的第一班學生，防守的是最前線的兩個坎地，這是掩護與發揮火力最好的地方，於是幾挺機槍，由點射，速射，到全面的射擊，交叉出封鎖的火網，這時劉伯誠匪部，以兩個半團的兵力，展開包圍式的人海戰術，猛撲陣地，敵人的砲彈，雨點似的落入陣地，同學們慘叫，往來的機槍子彈，凝成了野戰般的嘶叫。

四個多鐘頭的血戰，同學們已死傷大半。共匪又增加了一團的兵力，從我們左邊，迂迴過來，這時我們不但腹背受敵，彈藥也快要完了！于是中隊發出命令，第一班掩護，半小時後可以自由轉進！其他同學轉進了！

這時我們九名，接受掩護的新任務！只剩下一挺機槍，一支預備自機管和七支步槍了！不多長時間，一大堆子彈，只剩下五六十粒了；九名同學已長眠的五個。四個堅強的鬥士，敵對者共匪一團兵力的攻擊，無形中我就是指揮官了。我發令說：「轉進了！提機槍便跑！」跟來的就是一片彈雨，雜亂中我的機槍助手，政大學言報社主黃毅夫同學的頭部被炸開，悲壯的犧牲了！

不知跑了多久，却衝入一家民房，他們看到我滿身是血，用憐憫的心，包紮了我的傷口，放我在一架竹床上。一覺醒來，已是次日午後，溫暖的陽光從窗縫斜射進來，這顆劫後的餘生又開

始了。』梁效今同學現任教輔仁大學。

以上三個報告，各有特點，將大邑之戰的情形，說得很清楚，袁珊同學的報告說明了大邑之戰將要發生；陳寬強同學的報告，說明作戰時情形；梁效今同學的報告，說明轉進的狀況。由這三篇報告中可以知道他們犧牲之大，及其忠勇精神的表現。

逃出大陸流落香港

本校學生入了軍校或戰鬥內閣警衛軍之後，我於十二月八日深夜乘教育部與我們留蓉專科以上學校負責人所備專機飛香港。同行者有四川大學校長黃季陸先生，雲南師範學院院長查良釗先生等。我到香港不久，四川大邑作戰失敗之後逃出戰場的同学，冒九死一生的危險，也陸續到了香港。我見了他們，有的受過重傷，行動不便；有的好多天沒有吃飽飯，面有菜色。而且他們沒有衣服，終日以疲乏不堪的身體與寒冷的天氣奮鬥。他們住在難民營裏沒有房屋，夜宿露天，痛苦極了。我看到了心裏萬分不安，我即電教育部請救濟。電文是：「政大忠貞學生近百人來港轉臺，日無一飽，夜宿街頭，又無船資，乞匯款救濟，盼電示」教育部接到這個電報，即電復，文云：「政大在港學生准一次每人發給救濟金港幣三十元，赴瓊船費二十元，船上膳費十五元三項合為七十元，按一百人計，共港幣七千元，除款另匯外，希望鍾志鵬章丙炎兄（即戚長城）核實點發，其仍有不服從命令，留居香港，不赴瓊參加海南青年服務團受訓者，決不再予救濟」

不久，教育部的款匯到了香港，是由章丙炎先生轉交，他是教育部的駐港專員。鍾志鵬是政大第一期畢業的校友，他在香港作事，對母校事極熱心。每次發款我們三個人都到，款由章丙炎保管，取具冊報也由其負責。此款匯到香港的第三天，海南島陷於匪手。本校留港的同學，既不能去海南島，而臺灣又不能來，真是痛苦極了。港幣七十元不是一個很大的數目，況且他們必須添購衣服和許多日常用品，無論如何省吃儉用，也不能維持多久。過了幾個星期，他們的七十元港幣用得差不多快完了。他們要求我和章丙炎先生再電教育部請求予以繼續救濟。我即電教育部，電文中有「乞匯款救濟，以免餓死」。由此可知我們在電報中說的很嚴重。可是教育部的回電說：「未便再予救濟」。這個電報到了香港之後，本校留港的學生大失所望，只有自己想辦法。

我到了香港本打算即來臺灣，前教育部長杭立武先生在三十三年三月初將我來臺的旅費寄給我，可是入境證沒有辦妥，他就離職了。因為交代，在新舊任交代之時，將我這件事忘記了，因此，我的入境證教育部未有代我辦。四月我在香港救濟政大學生的工作，業已結束，他們最迫切需要的是來臺灣。我為辦理他們的入境，須即來臺。可是沒有入境證而想來臺灣是絕對不可能。於是我就請郭驥先生代我辦入境證，只有兩個星期他就將入證寄給我了。我即購船票來臺灣。我到臺灣之後，向教育部及辦入境證的機關請求，發給他們的入境證，一切手續我願代為辦理，然因學生身份不能申請入境，格於規定，拒絕

了我的要求。後來他們能來臺灣，完全是他們自己想的辦法。他們不能來台而留在香港的同學，其情形之慘，世界罕有，嚴潔同學（現在美國）他的報告中說：「半年之內，逃港同學接近百人（寄讀同學在內）他們滯港經年，在此落難期間，有的露宿街頭，有的進入難民營內，穿的是百結之衣吃的是嗟來之物，舉目無親，告貸無門，一澀一磨，備極慘痛。然而他們始終逆來順受，毫無怨言，這種判然於是非之分，泊然於生此之外，不屈不撓，犧牲奮鬥的精神，真是可歌可泣無負於母校的教育」。

他們經過許多千辛萬苦，來到臺灣之後，即面臨幾個嚴重問題：第一是在臺沒有親友可靠的同學之住宿問題，第二是已經畢業同學的就業問題，第三是在政大未畢業的學生或寄讀學生的借讀問題。關於解決住宿問題。政大在大陸時，補助幾個校友出國研究，有的是五仟美金，有的是二千美金，補助我的是二千美金。我將這兩千美金，拿出來給校友會購買房屋，以為政大校友會會所，又可為他們來臺暫時下榻之處。校友會於三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收到此款給我一信，其文如後：「本會奉准成立以來，各項應辦事宜，業經逐漸進行。惟細於經費。致會址現尚無着，頃承慨將前此國立政治大學所補助台端赴美研究費用美金貳千元，悉數交還由本會應用，熱忱可感。當轉達我全體校友週知，並致謝意。」

校友會總幹事吳延環校友，以此款在重慶南路購房一棟，以為會所。不少由港來臺的同學就住在那兒，這才算解決一小部份人的住宿問題。

在本校肄業學生和寄讀生來臺後。由教育部分發各大學借讀，現在都早已完成大學學業。其中有在國內外得博士學位或碩士學位的很多，謀業的同學多得校友的幫助或是自己親友的設法，目前他們也都有了職業。

我自南京率領政大數百學生到杭州，轉廣州，遷重慶，最後至成都。我知道這些隨校遷移的教職員學生及工友最深。他們以政大是「總統一手培植的學校，受「總統偉大人格及精誠之感召最深，故不借任何犧牲，隨政府遷移，其目的是「愛國」「反共」「護校」以實踐「總統的訓示。尤其是學生意志最堅，他們在大邑於槍林彈雨之中，冒九死一生的危險，而不恐懼；他們逃往香港在調景嶺過難民生活，痛苦異常，在風雨寒冷飢餓窮困之下，達數年之久，受盡人間艱苦，而無怨言。他們都是赤忱愛國的青年，堅決反共的鬥士。

追隨中樞在台復校

我到台灣之後，為留港同學爭取入境，與當時教育部長程天放先生，發生爭論。程先生與政大有密切關係，教育部長杭立武先生與政大無關係。而程部長對於政大留港學生漠不關心，推得乾乾淨淨，杭部長對於政大同學之愛護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其所以不同的原因，是因天放先生聽信了讒言。說政大學生參加了軍校是軍校的學生不是政大的學生。其實政大是參加軍校，不是合併學校。後來他們來台後，還是以政大學生的身份由教育部分發各大學借讀。對我個人攻擊說我

離開成都時，只顧自己逃命，而將學校關防丟到廁所理。後來我將學校關防，繳呈教育部（有部令可查本件影印存政大）天放先生才恍然大悟。他向我說：「這是你的同學造的謠」。不久，有人又造謠說我在學校結束時交代不清。事實上，我依政府規定向審計部辦清手續。總統也知道此事。有總統府張祕書長岳軍先生，覆我的信如左，可以為證。

「大函暨附件均誦悉。承告關於前在代理政治大學校長任內現金財物會計檔案損失情事現經呈奉審計部核覆一節，經由府函詢審計部據復已暫予存備查核，業已轉陳，奉「總統十一月十七日批「閱」。」

我在陽明山莊受訓時，總統召見，垂詢政大遷校及大邑之戰的情形，我簡單扼要的向他報告。他聽了之後，訓示我：「政大此次始終隨政府遷移，是很好的學校。」張其昀先生當教育部長時，發表了一篇「大學教育與民族復興」一文，（政大二十八週年校慶紀念講）其中說：「政大復校的時候，外間難免有許多批評。我的答覆是：『回憶自南京撤退，由廣州而重慶而成都，政治大學始終隨着政府而遷移，在全國公私立二百零七所專科以上學校中，只有政大是如此做。到了成都以後政大學生二百餘人，參加軍校在四川大邑與共匪作戰，死傷慘重，永足令人追憶不已』」。

經過這番說明以後，批評者也不忍再說了，因此可知行動比說話更響亮，這是筆者希望政大各位同學以及全國青年朋友應自勉自勵的教訓。